

斯诺与毛泽东戴过的红军帽

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人民军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浴血奋战,为饱受屈辱的中国人民撑起了一片蓝天,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然而,让世人最早了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应当归功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人们至今不会忘记书中的那幅毛泽东身穿红军蓝灰军衣,头戴红星八角帽,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照片,它像燎原的星星之火,将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辉形象传遍了全世界。而这张照片中的红军帽,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它见证了斯诺与毛泽东的革命友情。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贫困家庭里。他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当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来到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和《芝加哥论坛报》记者,遍访了中国主要城市和东北等地。“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以后又目睹了1932年淞沪抗战和1933年热河抗战,结识了鲁迅、宋庆龄等一批民主进步人士。1933年至1938年,他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并有两年时间住在燕大校园里。

1936年7月初,在宋庆龄的介绍下,斯诺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绕道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进行采访,寻找真正的“东方魅力”。

毛泽东对第一位来苏区采访的外国记者十分重视,认为斯诺将不受国民党新闻检查的封锁,能够把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和主张,如实地在国外发表,这样就可以使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一切造谣诬蔑原形毕露,使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因此,要求红军各部队认真做好斯诺采访的接待工作。7月13日,斯诺、马海德两人秘密抵达保安,受到红军的热烈欢迎和接待。红军

给他们每人配发了一匹马、一支步枪、一套崭新的军服和一项红军红星八角帽。为便于采访,斯诺的住处被安排在离毛泽东所住窑洞不远的山脚下。

7月15日,斯诺接到通知,毛泽东主席将要正式接见他们。当斯诺等人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毛泽东住的院子时,毛泽东已经在门口微笑着迎接他们了。毛泽东用有力的大手握住斯诺的手,高兴地说:“欢迎!欢迎!”斯诺观察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住的窑洞实在是太狭小了。但就是在这简朴的窑洞里,毛泽东和斯诺在以后的4个月里进行过数十次彻夜漫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天早晨,在黄华等人的陪同下,当斯诺刚走进毛泽东住的院子时,就看见毛泽东站在窑洞门口,迎着和煦的晨光,容光焕发,神采奕奕,魁梧的身躯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高大、威武。面对这鲜活的形象,斯诺那新闻记者的才思迅速作出反应,他敏捷地举起挂在胸前的照相机,把镜头对准毛泽东说:“主席,让我给你拍张相吧!”毛泽东微笑着应允。可是,斯诺发现毛泽东没有戴军帽,便说:“请你戴上军帽,照个全副戎装的。”但毛泽东只有一顶洗得褪色发白的旧军帽,且帽檐已经软软地耷拉下来,戴这样的帽子照相显然不适合。毛泽东只好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借,可惜没有一顶合适的。正在这为难之际,斯诺灵机一动,顺手把自己头上的新军帽摘下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戴上后正合适。斯诺立即举起了照相机,“咔嚓”一声,把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拍了下来。照完了相,毛泽东缓步走到斯诺跟前,把军帽端正地戴在斯诺头上,紧紧握住斯诺的手说:“斯诺

同志,谢谢你。”斯诺像一个将要出征的红军战士般向毛泽东主席立正敬礼,周围的人都鼓起掌来。在随后的陕北采访活动中,斯诺一直戴着这顶红军帽。他十分珍视毛泽东戴过的这顶红军帽,一直把它随身携带着。

同年10月,斯诺结束了对苏区的采访,离开苏区进入东北军的防地。斯诺乘坐由张学良将军派来的一辆大卡车转道西安回北平。当时,车上装着一些麻袋,里面塞满了要送去修理的旧枪支。为了避免沿途国民党军警的盘查,斯诺把装有在苏区采访的素材、胶卷和红军帽的提包塞进了其中的一个麻袋里。半夜行车时他睡着了,车上的所有麻袋被卸下扔到了离西安20多公里的咸阳的一个军火库里,车到了西安斯诺才发现。他非常着急,心想把提包丢了,4个月的冒险采访将前功尽弃,将辜负毛泽东等人的重托;而且万一那提包被国民党军警得到,后果将不堪设想。斯诺费了好多口舌,才说服卡车司机和陪同的东北军军官立即原路返回,终于把提包原封不动地找了回来!

返回北平后,斯诺立即伏案撰写《红星照耀中国》书稿及有关红军的报道,有时忙得连电话也不接。1937年2月5日,燕京大学新闻学会在燕大校内未名湖畔的临湖轩召开大会。斯诺在会上首次演讲并放映了他拍摄的有关红军的纪录片、幻灯片等,200多名青年学生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红军领袖的形象,陕北苏区人民的生活、红军演习、红军大学和抗日剧团演出等情形,在燕大校园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斯诺的启迪下,燕大学生立即倡议组成了北平学生访问团赴延安(毛泽东和中共

中央领导机关于1937年1月13日由保安迁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苏区人民的热烈欢迎。抗战爆发后,成百的燕大学生陆续奔赴陕北,参加八路军,走上抗日救国的前线。

1937年5月,斯诺的妻子、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太阳报》代理记者海伦·斯诺受到丈夫的影响,秘密赴延安,她要完成斯诺对红军长征后续部分的采访。在她到达的第二天,毛泽东和朱德一同来看她。毛泽东亲切地说:“欢迎你到延安来。”海伦·斯诺笑着回答:“我早就从照片上认识您了。”海伦·斯诺取出衣袋里的笔记本中夹着的那张毛泽东头戴红军帽的照片,高兴地递给毛泽东说:“这是我丈夫给您照的那张相。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围困,我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里女扮男装,深夜跳出窗户,身上只带了您的照片。您知道,您的这张照片就是我来见您的自我介绍。”毛泽东眯着眼睛仔细端详自己头戴红军帽的照片,感慨地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这个一向不修边幅的人照出的照片会有这么好看,感谢斯诺同志。”

1937年10月,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这是关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工农红军情况的最早最详尽的报道,它向世人宣传讲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斗争情况,从而打破了国民党的长期封锁。1938年2月,上海租界内的抗日救亡人士以“复社”名义将该书译成中文,因当时所处环境而改名《西行漫记》。与此同时,斯诺还赶写了一系列关于红军的报道文章,寄往英美各国的报纸发表。这些消息和文章又迅

速用电讯传回国内,并在远东的许多报纸上刊发出来。斯诺还把他同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全文连同苏区情况综述交给《密勒氏评论报》发表,并配发了毛泽东头戴红军帽的大幅照片。它像一枚巨型炸弹震动了中国和世界。

在此后的30多年间,斯诺多次访问中国,数十年如一日地以其风格独特的报道、著作和讲演,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1960年斯诺访问中国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毛泽东感慨地对斯诺说:“我从没有骗过你,你也从没有骗过我。”他们两人这种相互信任的友情保持终生。1964年,斯诺再次访问中国,有一次应邀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舞台上站满了合唱队员,台前是大型乐队,舞台背景是一张毛泽东头戴红星八角帽的巨幅照片。斯诺入场后抬头看了看又看,惊讶地问道:“那不是我在1936年拍的主席相吗?”斯诺没想到,如今这张照片会在那么大的场合用上这么大的用场。斯诺非常珍惜与毛泽东的友谊,在自己家中时常把这张照片和这顶红军帽拿出来给全家人及朋友们观赏。他的两个孩子都还头戴这顶红军帽照过相。

1972年1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得知斯诺患胰腺癌动了手术的消息后,立即指示组成医疗小组前往瑞士(斯诺全家于1959年搬迁到瑞士),希望能把斯诺接回中国医治,并在北京日坛医院准备好了一套病房和一个医护人员。1月25日下午,由中国卫生部顾问马海德率领的医疗小组抵达日内瓦,在中国驻瑞士大使的陪同下,驱车前往日内瓦郊区埃善小镇斯诺的家。斯诺夫

14年不离不弃 他用爱唤回妻子

14年,丈夫不离不弃坚守在妻子身边,用陪伴和照顾将妻子从病魔手中拉了回来。曾被医生宣判因重度脑瘫或会瘫痪一辈子的妻子,在爱的呼唤下,睁开眼、开了口、能行走,被誉为“奇迹”。不仅如此,夫妻二人还孕育了一个新生命。他们的故事令人动容,还被评为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2月的一天,在上海金山区的一户普通住宅内,故事的男主角龚建强接受了广州日报记者的采访,基本康复的妻子叶红如小鸟依人般坐在一旁,虎头虎脑的儿子在屋里闹腾着,屋内挂着一件绣品,绣品上写着:真爱永恒。龚建强笑道:“这是别人知道了我们的事后送的,其实我并不觉得我有多了不起,我只是做了一件普通人应该做的事,尽了一个丈夫应该尽的责。”

新婚第五天妻子突然病倒
2002年5月10日,龚建强如往常一样与妻子叶红道别后便匆匆赶往单位。早上9时30分,他突然接到了叶红同事的电话,对方声音急促,只说了句“我们把你妻子送医院了,你快去医院”便挂了。

龚建强骑着自行车赶往叶红单位附近的医院,却被告知妻子竟是被送进了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龚建强此时有了不好的预感,赶忙又骑着车去了金山医院。

龚建强向记者回忆道:“在重症监护室里看见叶红的那刻,我整个人都蒙了,她躺在病床上,我喊她可她毫无反应。”叶红在一旁说道:“当时我只是想睡一会,就突然没了任何知觉。”其后,叶红被推进了手术室抢救,医生甚至不能保证叶红能活着出手术室。那是龚建强人生中最难熬的几小时,数不清的同意书等着他签字,而他手抖得几乎无法握住笔。签完这些同意书,龚建强整个人都瘫倒了。

傍晚6时许,叶红终于被推出手术室,医生说她的命保住了,但医生还告诉龚建强:“你妻子得的是脑血管畸形,属于重度瘫痪。”也就是说,叶红可能会在床上瘫一辈子,丧失行动和语言能力。

龚建强的心揪了起来,那年他不过34岁,叶红也仅26岁,他们才刚刚新婚第五天!周围的亲朋好友劝龚建强:“未必需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连叶红的父母也对龚建强说:“我们准备把她带回家,这是她的命不好,不能连累你。”

龚建强想了几个晚上,他想到叶红对自己的体贴——冬天天冷,叶红会骑着电动车,将家里最好的棉被送到龚建强家;龚建强爱吃牛肉,叶红就炖好牛肉给他加餐;每次听见龚建强家有脏衣服,叶红还会偷偷替他洗干净。“她这样全心全意待我,如果我病倒了,她会离开我吗?她若离开了,我会是什么感受呢?”龚建强动情地向记者说道:“我告诉岳父、岳母,叶红是我的妻子,只要我还有口气在,我就会照顾她一辈子。”

为了妻子多辛苦点值
龚建强开始了或许是没有截止期限的照顾。半个月后,叶红醒了,龚建强俯身亲了一下妻子,在她耳畔说道:“老婆,你放心,我不会离开你的。”叶红听后

泪如雨下。

其后3年多是龚建强最辛苦的时期,每天凌晨5时,他就要起床为叶红穿衣、做全身按摩,然后赶去上班。中午11时,他又要去午休时间赶回家继续为叶红按摩,为此,他再也没有在单位食堂里吃过一口饭。晚上回来做完饭,龚建强还要定时给叶红讲故事。

2004年的一天,外面下着大雨,叶红突然开口,含糊不清地重复说着:“下雨了。”龚建强形容那一刻犹如是对自己坚持的一个回报,他告诉自己:“行的,我妻子能恢复成正常人。”龚建强未曾料到,这份决心竟用了整整8年、2900多个日夜才最终实现。即便如今,叶红也未曾完全康复,但龚建强已经很满足,“医生告诉我,能恢复并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已经很不错了。”

只有龚建强和叶红自己知道,这种“不容易”是何等艰辛。叶红说:“我能下床后,他每天都逼我做训练,包括下蹲、推五指板、握米袋等等。被他逼急了,我还会闹脾气。”为了叶红,龚建强几乎将自己训练成专业康复治疗师,没有休息日,他的生活重心就是叶红。别人问他:“你这样辛苦值得吗?”龚建强说:“值,我换回了我的妻子,这比什么都值。”

如今叶红的身体大有好转,恢复了基本的行动和语言能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龚建强会鼓励叶红多开口说话,而叶红总会笑得很羞涩,然后捂着嘴说:“我说不来,还是你说吧。”

龚建强坦言在妻子能下床的那段时间,自己确实很累,但因为念着妻子的好,为人夫的责任以及自己对妻子的心意,那些苦咽下去也就熬过来了。

在记者与龚建强约采访时间时,龚建强总是抱歉地说:“我实在抽不出时间,因为空闲时间我们都去参加公益活动了。”参与公益活动是龚建强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他愿意带着儿子为社会贡献绵薄之力,如同当年亦有许多好心人帮助了他和叶红。

儿子是龚建强另一个心头好,他记得儿子出生时恰好是大年三十晚上,他说儿子是伴随大家祝福出生的。

其实,叶红的状况并不适合怀孕生子,但叶红却很坚持,有一次去医院复诊,叶红偷偷询问医生:“我能要个孩子吗?”医生想了想说:“可以。”龚建强害怕妻子再次遇到危险,叶红说:“你能冒险将我死心线上拉回来,我就不能冒险给你一个完整的家?”

叶红告诉记者,她如此这般执意想要一个孩子,是因为她深知丈夫想要孩子却从不敢说出口的隐忍,最重要的是:“我怕我会比他走得早,我想留一个孩子陪伴他,我怕他孤单。”说着,叶红忍不住又哭了,“儿子特别懂事,他监督我吃药,也会哄着我玩。有一次他对我说:‘妈妈,你的手快点好起来,这样你就可以抱抱我了。’”龚建强望了眼妻子,立刻转移了话题,边说边看看叶红。她的歉意和爱意,他应该都懂。
广州日报



北方古镇——滦州古城

看惯了江南水乡,让我们来这裡体会北方古镇的刚劲与柔美。刘嘉祯 摄

打工高中生撞宝马车后留下道歉信和钱

2月5日凌晨,河南省新密市一中学生骑车时不慎撞上了路边停靠的宝马车,他匿名留下字条向车主道歉,同时还留下了自己寒假打工挣来的300多元钱作为赔偿。宝马车主被该学生的诚实和敢于承担责任的行为深深打动。2月12日,找到这名中学生后,宝马车主不仅不追究的责任,还资助了他万元助学金。

52岁的薛战民是河南登封人,家住新密,在浙江绍兴开了一家公司。今年春节,薛战民回新密过年。2月4日晚,他把自己的宝马车停在了新密市西大街的停车位上。第二天上午9点多去开车时,薛战民发现宝马车的左后视镜被撞坏,左车门和车后方,分别有一条20多厘米的划痕。

薛战民刚看到车被撞了,心里很生气。就在拉驾驶室车门准备上车查看时,“我在门把手的内侧,摸到一个纸卷,打开一看,是一封道歉信,里面还包裹着311元有整有零的现金。”薛战民说,看了道歉信后,他一肚子的火顿时消了。

道歉信上这样写道:“叔叔您好:我昨天骑车不小心把你的车后视镜撞坏了,很不好意思,我心里也很难受,

我是矿务局的学生,寒假在城里打工,我给你留了钱作为补偿,我知道这不够,但我已经没钱了,非常对不起。对不起!!!”

“当时看到这纸条后,觉得没必要再去追究肇事学生的责任,就顺手把纸条撕烂揉成团扔到地上。”后来,薛战民觉得该为这名学生做点什么,就又重新把纸条捡了起来。

“这孩子利用寒假打工,说明孩子的家境不太好,但他撞了车子能勇于承担,并尽自己的能力进行赔偿,说明他是个诚实善良的孩子,我们应该对他的这种行为进行表扬和鼓励。”有了这个想法后,薛战民就开始寻找这名学生。

因为这名学生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2月8日上午,薛战民来到了新密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中队,向民警寻求帮助。他希望民警帮他找到一名交通肇事逃逸者,但并不追究此人的责任,而是想当面向311元现金还给对方。同时他还表示,“如果对家境贫困,愿意资助他完成学业。”

新密市交警大队的民警听完薛战民的讲述,也被这名学生的真诚所感动,同时也对薛战民的宽容大加赞赏,

表示将尽力寻找这名学生。

警方查看事发地点各个路口的监控录像,终于发现这个孩子经常出现在当地一家烤翅店。10日上午,警方找到这家烤翅店老板。该老板在查看警方打印出来的图像后,确认了这名孩子确实在他的店中打工。但是老板只知道孩子叫“亦凡(音)”,具体是哪两个字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她什么,因为寒假打工的孩子都是临时招用的,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薛先生的二女儿则劝说:“这钱是我父亲的心愿,也是他的承诺。一码是一码,再说,这钱是资助你学习的,如果你要赔车钱,可以等到你毕业挣钱了再说,这个钱必须要收下。”

最终,在新密市宣传部工作人员、交警大队民警的共同劝说下,楚女士和陈奕帆才收下了这笔助学金。

据楚女士介绍,陈奕帆还有个妹妹,两人均由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照看。陈奕帆上高二,平时住校。陈奕帆很懂事,每逢寒暑假都要勤工俭学。

陈奕帆说:“我记下了车主的电话,想以后挣钱了,把钱还给车主。”

中国青年报